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亲历者言】	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	徐景贤
【往事非烟】	暴风骤雨的1966	林小仲
【拒绝遗忘】	我印象中的“六七事件”	马晓力
【史实辨析】	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	谢甲林
【人物春秋】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	逢先知等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亲历者言】

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

• 徐景贤 •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一九六七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夺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

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段话：“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当时，我们对毛泽东、党中央所作的指示、讲话，以及发表的文件等，都是一字一句细抠的，从中学习领会新的精神，所以，学了《通知》，我认为夺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批判”、“清洗”和“调动”。同年的八月五日，毛泽东又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消息传来，我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几个月，经过北京来上海串连的大学红卫兵的启发，又受到从上海调去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我就决心起来造反。

◇ 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肯定上海造反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上海带领市委写作班成员宣布造反，召开了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提出了“火烧陈丕显（市委第一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打倒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砸烂常溪萍（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口号，毛泽东知道后当即对

我们表示支持。他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为他祝寿的饭桌上，称赞了我们提出的这几个口号，高兴地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

姚文元当场问他：“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翌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向我传达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并且告诉我最新的精神——毛泽东在祝酒时宣布：“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意味着政治斗争要进一步升级了。

我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兴奋万分，立刻向写作班的全体成员作了传达。我还说：“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我们要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立新功！”紧接着，我们抓紧筹备将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

◇ 中央文革调查员张春桥、姚文元来沪

就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召开前夕，一月四日的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受毛泽东的委派，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核心成员的时候，说了很多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坏话，对我们筹开的打倒市委大会表示关切，但开始时并没有提出向市委“夺权”的问题，张春桥倒是一再强调：“你们还是要抓住批判市委这个重点，让各级当权派去顶在第一线，不要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因此，我在组织撰写一月六日大会的三项通令的时候，没有提出“夺权”，只是宣布：“第一，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当时，在我的思想认识上，认为还是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内以及各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所以，我们在通令里请求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撤销有些人的职务，并没有想过由自己掌权。我当时还曾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承龙一起议论，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任职。因为，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省、市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任免权一直在党中央，不能由下边擅自“夺权”的。

◇ 《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刚刚到达上海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上海《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接管”报社，并在一月五日出版了第一张“接管”后的《文汇报》，刊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关照过我，他们到上海来的消息要“暂时保密”，我就没有告诉《文汇报》的造反派。所以他们不知道张、姚来到上海，反而派人连夜赶往北京，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接管”报社的事，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结果没有见到张、姚和其他中央文革的领导，只见了《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就返回上海了。

一月五日，就在上海武康路二号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工总司”负责人的会议结束以后，我收到了“接管”后出版的《文汇报》，我马上把报纸送给正在东厅休息的张、姚看，他们翻着报纸，感到十分意外。张春桥说：“我们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啊！”我回答：“他们接管报社没有和我联系。”姚文元很郑重地说：“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说罢，他们就匆匆返回兴国路住地向中央写报告去了。

一月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紧跟《文汇报》，宣布“接管”报社，还在报上刊登《告读者书》宣称：“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对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仍不表态。

然而，在北京的毛泽东看到了宣布“接管”和“夺权”的上海两家报纸，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一月八日，他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又说：“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他明确地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

据此，《人民日报》在一月九日转载了夺权后的《文汇报》刊登的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名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一月八日讲话的主要内容。

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对上海“夺权”的支持。张春桥、姚文元这时也表态支持两报夺权了。当时我想：一个基层新闻、文化单位的权好夺，但对于省、市委一级的大权怎么夺呢？我心中还没有底，张、姚也没有对此作出部署。

#### ◇ 《紧急通告》发表前后

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自从一月六日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以后，从各区、县、局到各基层单位也纷纷召开批判打倒当权派的大会。有些人打着造反的口号，提出了补发工资、提高津贴、提前转正、发串连费等经济要求，而各级当权派中的某些人又根据市委“经济上放宽一些，政治上可以争取主动”的指示，纷纷签字同意发放钱款和满足某些人的经济要求。如此一来，天下大乱，银行的钱款在几天中几乎被提取一空，一些重要岗位的职工大量外出串连，港口、铁路的运输物资严重积压。

有一天晚上，王洪文带了“工总司”的几个头头来到武康路二号，说是要找张、姚紧急汇报情况。由于只有我知道张、姚在兴国路的红色保密电话的号码，我就帮王洪文拨通了电话，王洪文汇报说：“刚才到发电厂去，上海只剩下四天剩煤了，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可是，张、姚听了汇报也毫无办法。

由于张、姚到上海后曾经面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结束病假出来工作，并说明这是中央的指示，陈丕显不得不站到第一线收拾残局。一月八日，陈丕显在锦江饭店召开会议，请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共同商讨制止经济风的措施。我派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代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严厉批判这股经济主义风是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决定联合发布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起来煞住经济主义风，以后并由各造反组织派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来指挥全市的生产工作。这个通告由朱永嘉起草，先由各组织负责人签名，由朱永嘉带回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我审定。由于通告要交市委印刷厂印二十万份在全市分发、张贴，就让陈丕显在《紧急通告》上签

字。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受到严厉批判的市委第一书记，在各造反组织联名批判他的文件上签字后才能付印，正好说明当时市委一级的权力还没有完全夺到造反派的手里。

我把朱永嘉起草的《紧急通告》交给两报公开发表，并把起草的经过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谁知道挨了张春桥一顿批评，他埋怨说：“你们刚刚搞了一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得到了主席的肯定，怎么又发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不乱了套吗？”我为此惶恐不已，还对朱永嘉说张春桥生气了，朱永嘉也惴惴不安。

#### ◇ 毛泽东下令向上海发贺电

还是毛泽东和江青帮了我们的忙。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送了两份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去的电讯稿：一、《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二、《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份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二至三日内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当时中央正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时间都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认为《紧急通告》好，因为由群众组织主动提出来比党和政府来讲要主动，以贺电来支持群众的创意更能顺理成章。这个贺电据《王力回忆录》和戚本禹的口述，是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一起根据毛的讲话起草的，然后把贺电拿到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讨论。由总理主持会议，参加讨论的有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江青、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杨成武、肖华，通过后由毛泽东签发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这个贺电创造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由中央向地方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大联合夺权的号召：“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上海是在一月十一日的晚上，从广播里得知这份贺电的。张春桥、姚文元兴高采烈地通知我：马上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他们到场，和大家商量如何庆祝中央贺电。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上，张、姚也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公众场合亮相，通过电视发表了他们文革中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

一月十六日，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用黑体字公布了毛泽东总结的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夺权”的基本经验：“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样，我们才明确了毛主席从理论上到实践上提出了要求我们向上海市委一级联合夺权。从此，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月夺权”的风暴刮向全国。

在中央贺电发表以后，上海的某些群众组织大搞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争相夺取市委的领导权，争着为自己的组织谋取一席之地，使上海的夺权一度陷入困境。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才使联合夺权取得进展。一月十五日，“工总司”二兵团和“上三

司”等组织向毛泽东发去电报，建议夺权后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群众自下而上的提名”，并要张、姚负责提出新的上海市委的组成名单。这样，张、姚名正言顺地出任新的上海权力机构的领导核心，陈丕显的第一书记实际上被罢了官。经过张、姚召集各造反组织负责人磋商，上海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建立了新的政权形式——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名为军、干、群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泽东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泽东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泽东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这就是“一月夺权”全过程所显示的基本特点。

附记：读者欲知“一月夺权”更详细的经过，请参阅本书末尾附录，我在1968年组织人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七章

~~~~~

# 【往事非烟】

暴风骤雨的1966

• 林小仲 •

在20世纪的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6年是极其黑暗的一年，是空前绝后政治灾难的一年。

报刊上从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发展到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中共中央下发“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北大爆发了聂元梓等人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推翻，批判修正主义，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展开。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都产生着极大的震动。长期极左思想的政治教育，地处首都的政治氛围，干部子弟中的信息来源，使北京的中学生，特别是海淀区干部子弟较为集中的大学附中，很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少数学生在圆明园遗址成立了他们参加“文革”的组织“红卫兵”，宣告“文革”中第一支红卫兵的诞生，这一组织最先影响波及到北京海淀区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师院附中、101中学等干部子弟集中的学校。

6月7日上课铃响后，如往常一样喧闹的校园马上安静下来，我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突然连接全校各个班的有线广播里传来争斗的声音，有人抢过麦克风高喊，“同学们，有人在抢占校广播室，大家快来保卫广播室，保卫学校党支部”。顷刻间学校像炸了窝一样，大家涌向楼道，涌向教学楼一楼二楼连接处的广播室。等我跑到那里时，一楼至二楼楼梯上、一楼大厅里全站满了同学、老师。口号声、叫喊声连成一片。后来有人喊，到大操场辩论去，人们又涌向了大操场。在围成人墙的大操场中，显然是有人事先筹划组织好了这次的事件，几位面熟的高中同学在声泪俱下的控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指责学校领导不突出政治，搞分数挂帅，尤其是迫害了他们这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但是，他们的观点马上遭到其他一部分师生的反对，平静的校园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

辩论和对峙。那天师院附中发生的事件，惊动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我们事后才知道，当时由团中央负责北京中学的文化革命。我们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见到他，他戴个眼镜，一身简朴，被师生们团团围住，讲了一些要大家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之类的话。胡启立样子很斯文，与其说是位领导，不如说更像一位老师。他讲话逻辑性很强，但应付这种混乱的场面，似乎也有些力不从心。尤其是学生们这种造反是对，还是错，不得而知。我的同学们，那些平时文静的男孩、女孩们含着眼泪，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口号声响成一片。

师院附中很快成立了红卫兵，而且一开始全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红卫兵，并有人跑出来主张把“师院附中”改成“首都红卫兵战校”。我也学着其他同学，从柜子里翻出爸爸、妈妈的旧军装穿在身上，虽然大得不合身，可在那个岁月，这身旧军装是革命的标志。从此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大字报里经常爆出许多危言耸听的消息。1966年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鼓动下，成千上万十几岁的中学生，在校园里掀起了“造反有理”的浪潮。师院附中司局级别的女书记被打倒了，秋粟书记是位颇有资历的老干部，她给人的印象，高雅、沉静。她身体不是很好，来学校也少，学校日常工作由艾校长负责。15岁参加革命的艾校长也被打倒了，从团市委青工部长位置上调来的副校长王浒也被打倒了，王浒校长相貌堂堂，身材高大，曾是解放后第一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他的夫人是当时的团市委书记，“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汪家璆。学校里一些老师被无端扣上各种的罪名关进了劳改队，受尽凌辱和折磨。

数学组田钦老师的弟弟不知什么原因，同校红卫兵保卫组发生争执，被他的同龄人殴打致死。事后有人告诉我，在校外一次红卫兵集会报出身时，这个一般家庭出身的孩子，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说自己父亲是解放军的一位将军，就为这件事，一个十多岁的中学生丢掉了性命。就在他丧生不久，他冒名父亲的那位将军，也因“文革”冤屈自杀身亡。师院附中生物实验室的喻瑞芬老师，一个因莫须有罪名，戴过右派帽子的女老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初中学生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在校园的操场上。她被打死后，我目睹了那副衣不遮体、死不瞑目的惨状。学校的教导主任和外语组的一位俄语教师，均是女老师。女俄语老师被折磨的原因，竟然是她美丽的容貌，得体的服饰，太像资产阶级。她们被剃成阴阳头，被军用皮带打得遍体鳞伤。一个有着高素质教工队伍、有着优美教学环境、有着良好的学习风气的校园，顷刻间变成了人人疯狂、人人自危的集中营。一群善良、诚实好学的中学生，突然变得失去了人性。

由于红卫兵的举动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顿时身价百倍，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造反有理从学校又冲向了社会。北京郊区一夜之间有多少戴着地富帽子的人被打死不得而知，全市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端批斗更无法统计。连才华横溢的历史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第一任人民日报总编、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一代文学巨匠老舍先生都没能够幸免于难，更不要说万千热爱这个国家，曾为这个国家辛勤工作的普通人。多少人被游街、批斗、拷打，甚至被驱逐出北京无法统计。顷刻间法律和秩序都被踩在了脚下，共和国的首都到处充满着血腥。

1966年，整个中国陷入空前浩劫之中。众多的开国元勋受到迫害，几代知识分子横遭凌辱，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摧残。当时也卷入革命洪流中的我，每天都能见到、听到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在有一次师院附中的学生们在残酷地批斗教导主任赵幼侠时，原本瘦弱的她，被连踢带打，我站得离她很近，她在挣扎中无意的抬头和我目光相撞，当时我感到心灵深深地受到刺痛。这个我叫阿姨的老师披头散发的惨状，使我无法再看下去，我扭头拨开狂怒的人群，一直跑到学校一个安静的地方才停下脚步。我想难道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不是请客，不是做文章的革命？我找不到答案。诚然，在那个年月中我也跟着狂热过，甚至感情上

伤害过看着我长大的师长。“破四旧”中我也跟着做过一些傻事，连我妈妈一瓶漂亮造型的绿色玻璃瓶的雪花膏，也被我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扔掉了，多少年后我妈妈提起这件事还耿耿于怀。

1966年8月17日晚，那是在师院附中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黑压压的同学站满了操场。第二天8月18日，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大家都期待着能参加那个盛大节日，我们在等待着公布明天去天安门的名单。晚七时左右，校红卫兵头头们在学校有线广播里宣布了去天安门的名单，还宣布全校“非红五类”人员被开除出红卫兵。按照他们的标准，我和许多同学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个晚上，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这对在政治上狂热追求上进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而经受这种政治歧视打击的不过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这也为首都中学红卫兵分道扬镳，各立山头、誓不两立留下了伏笔。

1966年8月18日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的起点。这一天毛主席亲自带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登上天安门的红卫兵代表中，师院附中就有四十多人登上天安门城楼。那张著名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照片中，有多位开国部长、开国将军的子女依偎在毛主席身边，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师院附中我的同学。林彪副主席发表了煽动性很强的讲话，从此红卫兵运动席卷全中国。“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悲剧，给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给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给善良的中国人民，带来整整十年巨大的灾难。

那些作为天之骄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们何曾想到，他们幸福的欢笑也未能在那一双双充满稚气的脸上停留许久，他们很多人的父母竟然很快成为“文革”的斗争对象。没有用多长的时间，许多领导干部也大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无端被打倒。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深知法制、民主对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

~~~~~

## 【拒绝遗忘】

### 我印象中的“六七事件”

· 马晓力 ·

1966年我在（北京）师院附中上高二。这年的6月对我来说，“文革”来得很突然，我一开始有点懵。怎么文化界的大批判，忽然变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场“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要对着谁？回家请教了刚刚从大连社教回京的父亲马文瑞，他说得更靠谱，他若有所思咬文嚼字地说：文化大革命嘛，就是文化人的事情。

和所有当时在校的师生一样，6月7日这一天是我们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不仅距我18周岁生日仅差两天，而且那一天发生的剧变成为附中标志性事件，是一个分水岭，从此学校走向毛主席所要求的“大乱”，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大分裂。这道裂痕深刻在这一代人的身心，成为抹不掉的时代印记。

6月7日早，还未正式上课，是每天惯常听校广播的时间，我们班在教室里静静等候校领导如往常一样广播训话。半天，杳无声响。正莫名之际，有线广播突然传来：“同学们，有人抢占校广播室，大家快来保卫校广播室！保卫校党支部！”话音刚落，已听到楼道里挤满了人，乱哄哄的。这时，班里有位同学说，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坐在这儿？我们应该支持高柯柯到广播室讲话。倾刻，班里象炸了窝，乱作一团，再没有一张安静的课桌了。

我好奇地跑到了二楼广播室门前，一看挤满了人，当中被围着的正是那位我敬慕已久的第一批高中学生党员、一贯以艰苦朴素著称的高柯柯，她正对着主持发展她入党的教导主任杜森老师大声喊着：“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广播室？我们有话要向全校同学讲！”这场面令我始料不及，二者都是我平素敬重的人，此刻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口号声、叫喊声和互相推挤的人群使一、二层楼道楼梯形成一个风暴眼！一时间，我心咚咚乱跳，真是慌了神。正不知所措时，听到有人喊：不让进广播室，咱们就都到大操场去辩论！于是，人们簇拥着高柯柯和杜森主任向操场涌去。我跟着人流到了操场，人越聚越多，乱哄哄，有人搬来椅子，让高柯柯站在椅子上讲，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听不清讲些什么。这时，有人问我：怎么办？这不乱了吗？有人说：艾校长不知在哪里？他可能还不知道这儿的情况。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赶忙去找艾校长。正在楼道里窜来窜去时，突然看到很多同学围在艾校长身边，被拥着往楼道东边走，我迎头向艾校长喊了声：艾校长，学校乱了，怎么办？艾校长说：学校不能乱！我去向上级反映。你们有什么办法也想想，不管怎样，学校不能乱！

一时间我受到了鼓舞，定神想了想，正好我姐姐好友的爸爸是刚刚新上任的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雪峰。我兴奋地立刻搜出小电话本冲到传达室，将电话直拨到了李雪峰家里，他的秘书接了电话。我气喘吁吁地说：我有重要事情报告，一定请李书记接电话，我是谁谁家的，谁谁的妹妹。不好了，学校乱了，快派人来吧。很快李雪峰接了电话，说：不要着急，我们会马上请团中央派人去的，告诉同学们，一定要遵守秩序。我说：快派人来，越快越好！

我异常兴奋地去报告艾校长。只见艾校长正慌张地从楼道里向院外走，我说：艾校长，我给市委书记李雪峰家里打了电话，他说马上让团中央派人来。艾校长点点头说：那好，那好。我焦急地等着李雪峰书记派的人来，左等右等不见来，心象长了毛刺一样忐忑不安。而操场上辩论气氛愈加火爆，有声泪俱下控诉的，也有高呼口号保卫校党支部的；站在反对校领导学生一边的徐顺刚老师没讲几句就被人举着写有“大右派”的标语轰了下去，并被“押”走。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大约十一点半了，突然有人高喊：上级领导派人来了！只见来者急匆匆地走进教学大楼，一边走一边说：“我是团中央的，我叫胡启立。”这时，我悬着的心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胡启立在学校礼堂的台子上讲了一通话，无非是要大家遵守纪律，照常上课，不要出校上街游行。他最后高声说：“革命同学们，我支持你们！”同学们也分不清他支持的是谁，却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

胡启立来了，很快又走了，似乎对那种混乱局面，他也无能为力，象是面对燃起的大火，浇了一瓢开水。扬汤止沸，毛主席点燃的大火，谁能抵挡得住！从这一天开始，学校便燃起了“文革”熊熊大火，学生分裂、教师分裂，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全然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如果以6月7日当天划线，我是“保皇派”，但过了那天，就再也不敢当保皇派，保校领导了。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文化大革命”，做革命的促进派！表面看这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得紧，转得快，可实质就是一种惶恐、恐惧笼罩下的投机心理所致。因为毕竟也有同是学校团干部和学生党员的同学没有盲目造反，他们背负着被人们指责为保校领导、保皇派的诋毁，抬不起头来，这在当时红色恐怖的氛围下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良心！比起他们，我感觉自己人格和人品上矮了一大块。这是多少年之后，在我对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有了一定认识后的一点敢于直面自己灵魂的、可怜的反思吧。



“文革”开始前我正在争取加入党组织，也是学校重点培养的积极分子，只是因为年龄不到，没有成为最早两批学生党员。造化弄人，“六·七事件”两天后生日那天，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却是加入了红卫兵。那天我们胸戴小小的金黄色毛主席像章和一枚象征党中央的天安门小像章，握拳高高举起右手，在校门口的红旗下宣誓加入了红卫兵。领誓者不是校领导，也不是团支书和班长，而是一名连团员都不是的同学。记得誓词有这么一句话：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永远做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兵（简称：红卫兵）！后来听清华附中的张承志说，5月29日晚，他们在圆明园废墟上议论：当年苏联十月革命有一批自称是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和列宁的红色卫队，有叫赤卫队的，也有简称红卫兵的。于是，他们仿效成立中学生造反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中国红卫兵诞生了。此后，他们连写三篇论“造反有理”文章寄给毛主席，并获得毛主席“热烈支持”！“红卫兵”由海淀中学的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到北京各院校乃至全国。

1966年的10月，我因父亲被打倒成走资派而变为“黑帮子弟”，悄悄自动退出了红卫兵，“兵龄”不足四个月。

6月中旬，学校如同往年一样，去郊区农村帮老乡麦收。少许人留校，我和我们班不少同学被分到教师楼负责看管留校的老师和校领导。那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校园里，都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斗地主的方式，兴起了无端或故意打骂、侮辱老师和校领导的野蛮行径，给他们随意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戴高帽、游街，关劳改队、囚牛棚，他们受尽凌辱、恫吓和折磨。为避免有的老师和校领导发生意外，我们班若干人被安排轮流值班和查夜。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位安排在我前面值班的同学突然惊恐不安地找到我说：今晚艾友兰（艾校长已成了看管专政对象，没有了人身自由，被关在学校教师楼里）可能有情况，他几乎写了一晚上毛笔字，只写一句话，也不睡觉，你快去看看。我急忙跟着他到了艾校长房间，门是开着的，艾校长侧身对着门低着头写毛笔字，见我们来了，缓缓抬起头望了我一眼，然后继续写字。这是自6月7日那天后，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只见他面容憔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疲惫不堪的眼睛充满血丝，头发有些蓬乱，人显得有气无力，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他面前横着一张长方形的课桌，桌上布满一条一条的毛笔字幅，字迹工整、清晰，一条条看下去全是同样的一句：“一失足成千古恨”。只有这七个醒目和令人惊异万分的大字！他一遍遍反复地写，写了一床一地一桌子。这七个触目惊心的字，深深地映入我的眼帘和脑际，抽打着我的心，搅扰着我的思绪，令我心碎，令我多少个夜晚辗转难眠，直至47年后依然让我灵魂颤栗、惊魂不定，难以名状。我想，艾校长经历的那些非人的日日夜夜，让他这个15岁就投身革命，出生入死追随党的热血男儿受了多大的刺激和伤害，才有如此之悔恨和怨艾。我想，他年轻时一定有很多选择，处在那种境遇下的他，一定会想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么个曾被认为是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莫说艾校长了，自“文革”开始不久，我就暗自发誓狠下心，今生今世决不当教师。可是命运偏偏如此捉弄人，“文革”后期，为了能回北京，我竟然争着报名当老师，被挑选为回京补充师资队伍的老高中生。即便当了老师，对教师这个职业依然是心存疑惧和后怕，总有阴影缠身。

“文革”过去多年后，我和几位同学相约去看艾校长，见面后，他依然笑容可掬、亲切和蔼，全然没有“文革”所受磨难、屈辱的丝毫痕迹和怨愤。大约是2007年，又去看过艾校长，见我们来了异常高兴，他正在家里练书法，依然是那笔好字，还拿给我们看。他是那样的爽朗热情、兴致勃勃，和“文革”时那晚的愤笔疾书形成巨大反差。没有几年，听说艾校长患了重病，我们马上赶去空军总院看他，见到他，我吓了一跳，好端端的一个艾校长，被病魔折磨得面黄肌瘦，孱弱不堪。他强打着精神和我们说话，偶尔还笑笑，显得很吃力。不成想，那次见面竟成永诀。2010年7月20日，艾友兰校长溘然长逝，离我们而

去。举行遗体告别那天，我不在北京，但听说去了很多很多的同学和老师，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重。

1966年6月7日，此生难忘之日，也是不应该忘记的日子！

◇ 摘自首都师大附中《百年回首》

~~~~~  
【史实辨析】

### 评舒声和郑实的谎言

• 谢甲林 •

最近，北大校友寄给我两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一是2016年8月郑实在《燕园风云录》（四）发表的《他们为什么要整学生——从工作组、校文革到宣传队的一脉相承》（以下简称“郑文”）；二是2016年11月15日舒声在《记忆》第174期上发表的《北大校文革二组整了哪些“黑材料”？》（以下简称“舒文”）。读了这两篇文章，我深感惊讶。在“文革”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的今天，舒声等人还在用1967年7月26日出版的《新北大报》刊登的“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的谎言来证明自己新的谎言，并声称当年砸抄的行动“是值得肯定的正义之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我是1945年4月参加革命，1950年3月入党的干部。1958年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被抽调到党委书记、校长陆平直接领导的“马列主义研究室”哲学组任政治理论教员。1960年，该室并入哲学系。1963年3月，我奉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做批捕、起诉、出庭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人事工作的党委书记李放，通知我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最高检察院来函通知要谢甲林去北京大学作保卫工作。”我说：“服从组织，要求不要留在北大。”

1966年6月22日，我到北大工作组报到。先是分配我和另一人到图书馆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在图书馆工作了几天后，工作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把我调离图书馆，让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蔡润田是海军保卫部副部长，组员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干部。在燕南园63号和66号办公、住宿，主要承担：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来北大时的安全；周总理确定的6名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安全；北大师生和外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到北大看大字报和大串连的人身安全；维护北大的治安，保护北大财产的安全；自行或协助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上报和侦破反革命案件；其他刑事案件和自杀案件的勘查、处理工作。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在大会上，聂元梓请求，中央文革批准，万人大会通过，宣布留下二组原班人马，继续承担北大的安全保卫工作。校文革成立后，二组改称保卫组，由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北大人事处副处长、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白晨曦主管，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又选调校卫队队长周俊业、法律系63级学生蓝绍江、地质地理系保卫干事臧三江到保卫组工作。经总政批准，海军人员于1966年12月撤离北大。因高检院被砸烂不能报批，我不能撤离，白晨曦让我接任组长，从法律、哲学、中文等系选调九名学生、教员、干部，重建保卫组。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校文革及其所属组室全部停止活动，独留保卫组继续工作，仍然让我任组长，接受宣传队指挥部领导，由军代表李志刚联系。经谢

富治批准，1969年1月24日我离开北大回到高检院，随同高检院全体人员下放到湖北省沙洋农场办“五七干校”。

“文革”刚开始，北京卫戍区通知北大工作组：周总理指示，北大的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驊、温特（美籍教授）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要北大做好他们的保护工作。为此，二组（保卫组）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给每人每户参照军队的做法结合北大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警卫档案，写明了他们的家庭住址，人口情况，四方邻居，从事职业；二、副组长陪同组长挨户走访，向对方说明他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告知保卫组的住址、电话和联系人，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和情况，随时向我们反映；三、编绘了每人每户的平面图，选定了巡逻路线和放哨地点等；四、安排了24小时轮流值班，电话记录和每人每户的具体保护人员。在工作组和校文革时期，六名重点保护对象和家庭没有发生任何安全问题。

“郑文”说：“工作组为什么能很快抓出6·18事件中打人的主要分子，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保卫部门，其中有专业的保卫干部如谢甲林，也有从法律系吸收的被工作组认为政治可靠的学生。”“舒文”补充说：“二组从法律系抽了几个学生参加工作，有蓝绍江、苑世男等”。——事实是：6·18事件发生时，我还在高检院，6月22日到北大，6月底才到北大保卫组工作。另外，蓝绍江是1966年8月初选调到保卫组的，而苑世男则是1968年8月19日工宣队进校后，在我建议下从原“井冈山兵团”保卫组选调的三人之一。

“郑文”说：“1967年7月10日，‘红旗飘’和‘北京公社’等组织查抄了校文革保卫组二组驻地南阁和燕南园63号，抄出两批二组整的黑材料。”“舒文”补充道：“更加骇人听闻的是，他们还整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点名保护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同志大量的黑材料。”

众所周知，打、砸、抢、抄保卫组的后台是陈伯达。工作组保卫组和校文革保卫组从未驻过南阁，从未在南阁存放过任何材料或其他东西，也不知道任何组织或任何人存放过什么材料。1967年7月10日凌晨，陈伯达来北大，被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红旗飘”、“北京公社”等围住，牛辉林等借机诬告说：北大有个工作组留下来的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他们不作保卫工作，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陈伯达随口说道：“那就叫他们停止工作。”陈伯达讲话后不到两小时，牛辉林等人便带领“红旗飘”等组织的群众到燕南园63号打、砸、抢、抄了校文革保卫组，扬言抄出两批由二组整的“黑材料”。他们对周培源说：“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不光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还整了您的黑材料。”周培源说：“他们是特务机构，就应当砸烂。”接着，牛辉林等一些人在大饭厅举办“黑材料”展览，我亲自去看了这个“展览”。所谓抄出的由二组整的“黑材料”，其中之一，是工作组二组时期给六名（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驊、温特（美籍教授））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建立的警卫档案，其中第一卷是周培源的警卫档案。为此，我带领保卫组分管警卫工作的周俊业和分管办案工作的蓝绍江以及协助警卫、办案工作的校卫队干部肖祖德，亲自到周培源家，予以澄清。我们当面对他说，我们都参观了“黑材料”展览，牛辉林等人告诉您所谓“黑二组”整了您的“黑材料”，是工作组二组为您建立的警卫档案，当时二组组长蔡润田和副组长谢甲林亲自到您家访问过，已明确向您告知：您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并把二组的住址、电话号码和联系人等写在一张纸上给您了。以后，又把对您的保护工作，在档案中作了记录。现在，您竟说“保卫组是个特务机构，应当彻底砸烂”这样的话，这是有失身份的，望您检讨、道歉。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护您了。

1967年8月17日，“红旗飘”、“北京公社”等五个反校文革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周培源出席成立大会讲话，出任核心组组长，牛辉林等四人任副组长。从此，周培源离开家，住进28斋兵团总部，保卫组就无法对他实施保护了。8月24日，我被井冈山兵团绑架毒打致伤，保卫组停止了工作。后经校文革、北京市卫戍区、公安局请示，谢富治批准：“同意恢复工作，材料也应交回。”为了继续做好周总理指示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保护工作，我把周培源上山担任井冈山兵团领导和已离开家入住28斋总部的情况，通过卫戍区上报给周总理。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接着，北京卫戍区通知保卫组转告周培源，说：“李钟奇要给他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让我们把他送到卫戍区。”我亲自到28斋井冈山总部找周培源，被堵在门外，不让进去。我又到他家谈明情况，询问他在井冈山总部的电话号码，他妻子不愿告知，最后，我请他妻子给周培源打电话，要他给保卫组回电话，并告知了电话号码。第二天，通过电话告诉周培源说：“李钟奇要你到卫戍区给你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没有拒绝，但是，担心交通、安全问题。我说：“请您放心，给您派专车，保证您往返安全。”周培源同意后，我对他又说：“明天上午9时，我和专军在28斋东门前30米处路上等您，您从28斋的窗户上看到时，我们俩人相互招手示意，我就到门口接您，把您送上专车，我会告诉司机蔡师傅，事关重大，往返务必保证安全，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电话，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不到中午，周培源安全回到北大，又进入28斋井冈山总部，我们保卫组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周培源从北京卫戍区返校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内部串连会，让周培源介绍李钟奇等传达周总理指示的情况。周培源从井冈山总部回家居住后，我曾亲自登门访问过，他对牛辉林、井冈山等打、砸、抢、抄保卫组，绑架并毒打我的行为，主动认错、赔礼道歉。我对他说，按照周总理关于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指示，我们将继续而且进一步加强对他和家人的警卫工作，再次告诉其保卫组的电话，有关人员、财产和其他安全问题，随时联系，保卫组一定做到随叫随到，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安全服务。他深受感动，一再赔礼道歉。

另一部分所谓“黑材料”，是保卫组配合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侦破反革命案件搜集的笔迹资料。查对迹痕，属侦查破案范畴，是高等法学系、院校的一门重要的刑事技术学科，是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一项重要的刑事技术工作。它是破案工作的重要手段，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单就笔迹而言，通过笔迹筛查，把绝大多数或百分之百不沾边的笔迹人排除，对他们是有利的。例如，有一天在地学楼南墙外贴出一张署名“赤心”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攻击林彪，说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但标题却是《毛主席的晚节保不住了》。当时，保卫组把它作为一类重大反革命案立即报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立即派侦察员到北大来了，要保卫组协助破案。为此，保卫组向各系各单位收集、借阅了大量笔迹资料，其中确有“舒文”中说的“收集了一些学生的学习笔记本、日记本、入党、入团申请书和大字报底稿”，其目的是查对“赤心”大字报的笔迹。经过反复查对，排除了北大的人作案。最后，公安局从外校侦破了这起案子。事实证明：收集、查对笔迹，对破“赤心”一案，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有益的手段。用收集、查对笔迹进行破案惩罚犯罪，保护好人，是世界各国的通例。郑实、舒声等人怎么到现在还要把它说成是“黑材料”呢？这是因为“无知”？还是别有用心？或者被人利用？就要请他们自己解释吧。

保卫组协助公安局在北大学生中侦破的最大反革命案件是“中国X小组”案。1968年1月上旬，北大学生杨绍明（杨尚昆之子）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感到问题严重，便立即主动交给了保卫组。信的落款是“中国X小组”，附有《中国X小组宣言》。信的台头是

杨绍明，内容是动员他参加“中国 X 小组”和联络方式：回信用牛皮纸信封，地址是清华大学某某楼，约定的日期是某年、某月、某日。保卫组马上把这封信和《中国 X 小组宣言》报告给北京市卫戍区和公安局，他们认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马上派侦察员到保卫组合作破案。我们一方面收集笔迹资料，查对笔迹，并按照“中国 X 小组”的联络方式寄去一封空白信；另一方面派保卫组的蓝绍江和公安局的侦察员一起“蹲坑”守候。其间北大学生傅某（彭真之子）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也交到了保卫组。“蹲坑”到第三天，发现果然有人来了。来人把信拿走后便立即进了厕所，当他刚拆信时，被我们“蹲坑”的人员当场抓获。经审讯查明：写信人的真名叫谢世扬，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井冈山兵团的成员。接着搜查了他的宿舍，查获了他的油印工具、《中国 X 小组宣言》底稿和尚未发出的《中国 X 小组宣言》等。经查对笔迹、指纹等痕迹，落实了全部案情，完全确认是谢世扬作案。当天，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批斗会，谢世扬当场被公安局依法宣布逮捕，被警车拉走。因为保卫组不知道“井冈山兵团”的电话，无法将此事通知“井冈山兵团”，就用发表《声明》的方式，予以通知，希望“井冈山兵团”予以配合。次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谢世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开除。”

《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1月17日新北大公社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揪斗原红旗飘战斗队成员谢世扬，说谢是“现行反革命”，加以逮捕。

这条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我希望在允许的情况下，请北京市公安局、现北大保卫部将《中国 X 小组宣言》全文公布于世，以正视听。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67〕19号）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讲了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插话：“还要誓死保卫周总理”。这些成了当时保卫组工作的信条。1968年3月，西语系保卫干部到保卫组报案说：有两个小青年在西语系图书馆从一本杂志上偷撕了一张有30年代江青同志与他人一起的剧照，是阶级敌人搞江青同志黑材料的反革命行为。对此，保卫组向中央文革、市公安局等单位写了《情况反映》。不久，市公安局派人到保卫组联合破案。经查，不是北大的人作案，保卫组就退出来了，由公安局自行侦办。据说公安局从人民大学附中破了此案，抓走两名作案学生。最后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

北大保卫组的全体成员，自始至终没有参加过群众组织，没有写过大字报，没有离开北大到市内和外地串连过一天，全心全意投入了北大的保卫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人事关系、工资关系等都在高检院，自始至终不是北大的人。

“文革”期间，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1966年6月22日到1969年1月24日，先后在北大工作组保卫组和“校文革”初期任保卫组副组长、组长；1968年8月19日宣传队进校后任宣传队保卫组组长；1969年1月24日调离北大。二是从1969年1月24日到1972年7月在高检院和“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三是从1972年8月调到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主要是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980年1月调至北京市司法局工作。

我在30多年的司法工作中，养成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习惯。不论办案，还是回忆历史，都是遵循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事实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捏造、歪曲，它是不能改变的。认识是主观观点，是可以改变的。回忆历史，必须根据史实，才能避免谎言、欺骗读者，这是至关重要的。

高检院离休干部 谢甲林

2017年1月

~~~~~

# 【人物春秋】

##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 ——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

·逢先知·吕 澄·沈栋年·王象乾·

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戚本禹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他们是：

逢先知，1950年3月2日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在中南海，后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调入的时间，分别是：

吕澄，1949年8月9日，当时在香山。

沈栋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绰，1949年5月，当时在香山，是第一个帮助田家英处理群众来信的。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此次座谈时，他通过电话表达意见。

除逢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八司马”的成员。

以下是这次座谈的纪要。

座谈中，大家对下面几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们同戚本禹都相处十多年，对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毛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老师”，“不是好人”。周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以其自以为是的膨胀个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固立场，他对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对给他带来“人生辉煌”的“文化大革命”无限留恋，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

大家一致认为，《回忆录》谎话太多。他在去世前抛出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谓“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实用心，却不这么简单，必须揭破。

一是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极力美化江青，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谓“回忆”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无论他是否接触过，在他笔下都不是好人，让人觉得“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一辈革命家应该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写的“文革”前的内容，就一个主题：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江青的信任。写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也是一个主题：处处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恶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坏事都是别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许多“好事”。

第三，《回忆录》叙述的事情有怎样的迷惑性？

确实要承认，戚本禹很会写“回忆”。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没有用在正道，在《回忆录》里也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事情编得很圆，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经历，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许多事，人们会认为他的回忆揭了许多“秘密”，“有价值”。二是，他很善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添枝加叶，用一些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写，吸引读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笔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发挥，把“故事”讲圆，使之看起来很有逻辑。

戚本禹在《回忆录·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当事人、知情人看来，特别是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对照，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叙述破绽，很多都是谎言。

我们几个都是与戚本禹共过事的人。以下大体按照《回忆录》的顺序，按照他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根据同他接触中所了解的情况，并运用一些档案材料，来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更恶劣的表现，因为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实际情况的人来澄清了。

十一、戚本禹为什么写《评李秀成自述》？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1962年底，在我担任《群众反映》主编的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于是我也把它找来读了。其中有吕集义编写的《李秀成自述》这本书。”“以罗尔纲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影响最大。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他并没有在上面写下什么批示。”

戚本禹又在说谎。毛主席从来就没有什么“阅读书目”，1962年底他也没有看过太平天国方面的书。逢先知保存着一本详细记载毛主席要书的笔记本，时间为1957年3月至1966年5月。毛主席要太平天国方面的书，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19日，要的是《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罗尔纲笺证）。第二次是在1964年7月31日（在北戴河），要的是关于李秀成的资料。送给他的资料有：影印的《李秀成自述》、

中宣部编印的有关李秀成的资料、7月27日《人民日报》、7月25日《光明日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两次都是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发表之后。

当年，田家英对《评李秀成自述》的看法和他对处理这篇文章的态度，逢先知比较了解。逢说：“田家英是不大赞成戚本禹文章观点的。他比较赞成周扬他们的观点。戚的《回忆录》里说，田对他的文章开始说‘写得挺好’，后来又不让发表，表里不一。这不是事实。事情的经过是：《历史研究》编辑部负责处理戚本禹这篇文章的编辑丁守和，曾打电话给田家英征询对戚文的意见。田家英明确回答‘不要发表’，并且说‘这个人不好’。丁守和将田家英的意见，报告了刘大年。刘大年反复考虑，认为《历史研究》当时如不发表戚本禹这篇文章，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他的意见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文，同时发表罗尔纲的一篇表态的文章，作些说明，争取主动。《历史研究》的另一位负责人黎澍是主张发表戚文的。黎澍对戚本禹的文章，密密麻麻地作了大量的修改，并将修改稿送田阅。我当时在场，看过这个修改稿，放在田的办公桌上。黎澍是用红笔改的。田家英说：‘如果我的稿子，被人改成这样，我就不发表了。’戚当然不会在意这些，只要能发表就行。果然，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反响，一鸣惊人。”

这里还要澄清一个事实。《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对周扬他们在批判我之前，没有给他打个招呼也不满意，他气愤地说，他（周扬）太霸道了。”

根本没有这回事。在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田与周的观点基本一致。况且田又不管中央宣传部的事，周扬不需要给他打招呼，对这种工作关系，田家英还能不清楚吗？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过：“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这句话透露了他的心机。1961年5月，田家英曾将戚本禹送给他的一份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送毛主席。主席作了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戚本禹一下子在党内出了名，尝到了甜头，很是满足了他出人头地的意愿。这次关于李秀成的文章，他知道田家英是不会替他转送毛主席了。此路不通，就另找出路。戚本禹说：江青“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

江青是怎样看到《历史研究》刊登的戚本禹文章的呢？吕澄说：“我听朱固说，戚本禹是通过江青把文章送给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本来是戚本禹与朱固合写的，朱固还到北京图书馆借过有关李秀成的书。文章发表了，只署戚本禹一个人的名字，朱固很有意见。”

前面我们说过，戚本禹说1962年底知道毛主席正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他也找来读了。这虽是谎话，却泄露了戚本禹内心深处的方向标：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这上面作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连篇累牍地发表言词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跃升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高位。但是，在他的笔下，不知害了多少人，包括老一代革命家和一些著名的学者。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曾说过：“我们一些‘左’派，就是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话中所指，就有戚本禹。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戚本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造出这样不知羞耻的谣言，来抬高自己。谁也不会相信，就凭他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和被戚称为“恩师”的田家英，会找他戚本禹合写文章！“田家英”三个字之后，还有一个“等”字，不知还有什么名人找他合写文章？

戚本禹一有机会，就吹捧江青，打压胡乔木、田家英。这正说明他是江青死心塌地的同伙。历史是公正的，被戚本禹颠倒的历史，早已颠倒过来了。

## 十二、从1962年的“包产到户”问题说开去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别有用心地从包产到户扯到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他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后，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或许也包括田家英。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竟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

戚本禹口口声声说：“田家英是我的老师，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却在转眼之间，就这样诬陷田家英。

网上还传出戚本禹对人说过这样的话：“主席为什么不信任田家英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他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该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情。当我后来接替田家英秘书室主任的工作时，江青告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戚本禹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在一些人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并将田家英归在这些人中，这是他以自己阴暗的内心世界去猜度田家英的想法。田家英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是有操守的，他懂得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

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后，田家英曾当面请示刘少奇关于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任职问题。刘少奇是说过，继续留任，张经武仍任主任。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这个机构，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戚本禹却在这上面做文章，说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田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等等。

我们问过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机要秘书李静（现年84岁）说：“田家英到刘少奇那里很少、很少，没有印象了。我们那里没有卫士记录。谁来，报告一下就行了，很随便。”秘书姚力文（现年92岁）说：“田家英和刘少奇来往不多。”卫士史国瑞（现年92岁）说：“没有见过田家英到刘少奇家里，一次没有。”卫士马传忠（现年84岁）说：“刘少奇与田家英往来不多。”上述这些人都是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最有发言权。

关于田家英与刘少奇的关系，逢先知比较了解。他说：“田家英同刘少奇接触很少。他们的接触主要是两次。一次是1962年田向刘汇报湖南调查。另一次是修改《关于农村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因为‘后十条’，田家英是在谭震林主持下的主要起草人。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田家英比较倾向于刘少奇的思想；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方面，田认为刘少奇‘左’，特别是表现在修改‘后十条’上。刘少奇说‘后十条’违反了‘前十条’精神，要根据‘桃园经验’进行修改。并要田家英随他南下，一起修改。当时田家英感到十分为难，但又不能拒绝。田家英带着我一起去的。离京的前一天，田家英请示毛主席，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主席主要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毛主席这两点意见，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向刘少奇作了传达。刘少奇没有说什么。这次修改‘后十条’，刘少奇要田家英按照‘桃园经验’的精神进行修改，这确实难为田家英了，因为要按照自己没有想通的意思去改‘后十条’，所以改得十分吃力，难以落笔。文件改完后，田家英立即从广州回到北京，不愿意再跟着刘少奇到广西等地去考察了。从那以后，刘少奇只找过田家英一次，让他开一个读马列著作的书目。从此他们之间再没有来往了。江青、戚本禹诬陷田家英是‘一仆二主’，能成立吗？”

这里顺带澄清一下《回忆录》中对刘少奇生活方面的攻击。戚说：刘少奇一家单独住了一个院子，屋里摆设豪华，吃螃蟹只吃蟹黄，等等。

其实，刘少奇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他的儿子进了他的办公室，受到刘少奇的训斥。刘少奇说：这是我的办公室，有机密文件，今后不准进来！关于刘少奇搬家的事，据刘身边的人说，刘少奇原来住在楼房里，爬楼困难，就搬到怀仁堂北边的一个院子里。这里原是林伯渠住的地方，林老去世后，家属搬出中南海，院子空出来了。刘少奇的卫士马传忠说：“屋内摆设比较简朴，没有什么豪华的东西。”李静也说：“屋内摆设，太简单了。”

戚本禹根据一些不实的材料演义出一个毛、刘关于“四清”问题的对话。《回忆录》中说：“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请问，刘少奇能这样对毛主席发问吗？毛主席真的点名张霖之与何长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没有的事。戚本禹演义出这个对话，说穿了，就是为他自己的罪行开脱，他对张霖之被迫害致死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你看，照他那样说，“文化大革命”前那个时候毛主席就已经定了张是走资派，再加上戚在《回忆录》里罗列张在任煤炭工业部长期间的一些矿难情况以及生活腐化等等，这样的走资派还不该批斗吗？戚本禹常常编造或者根据不实材料演义出一些“故事”，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关于毛、刘对“四清”问题的争论，是在1964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会议规模不大，有31人参加。会议记录根本就没有《回忆录》中所说的毛、刘那些对话，也根本没有提到张霖之与何长工。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根据会议记录这个权威档案，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

“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整人，心狠手辣。据当年参加批斗刘少奇的人后来交代，1967年在中南海内批斗刘少奇，戚本禹是直接指挥者。他对参加批斗的人交代：要搞得热烈，要杀气腾腾，不要文绉绉的，要斗出水平来，还要拍电影。可以摁头，可以让王光美低头。7月18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等开会时，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

戚本禹为了攻击别人，在一些大事情上胡编乱造一些“故事”，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也同样胡编乱造。例如，《回忆录》中《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这一部分，一开头就编造一个关于挂蚊帐的“故事”。当时，逢先知、戚本禹刚刚调到秘书室，彼此还不熟悉。戚说，只有逢先知有蚊帐，别人没有，他和几个人一起给逢先知提意见，逢就给田家英打小报告。

“故事”写得很生动，活龙活现，不知情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当时大家都有蚊帐，戚本禹本人就有蚊帐。说逢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更是无稽之谈。这里请读者注意一下，在《戚本禹回忆录》的另一个电子版上是这样说的：“逢经常主动给田家英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田，后来当了田家英的秘书。”戚本禹心虚，觉得这样说太离谱，在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就改了个写法。从这件小事情上也能看出戚本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再举几个例子。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田家英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杨尚昆、邓小平提拔他担任的，他因此对杨尚昆、邓小平一直怀有感激之情。他跟我说，还是杨公、邓公想到我呀。可这样一来，他就必须经常向杨尚昆去汇报工作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小平去东北视察工作的时候，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被一种毒虫咬伤，整个手臂都肿了起来。邓小平下令要省里的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他对这件事情也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知情人一看就知道，这都是编造的。那次东北之行陪同去的人比较多，有李富春、薄一波、杨尚昆等。田家英是带着逢先知一起去的。逢是亲历者，他说：“首先，戚说的时间就不对。邓小平那次视察东北，是1964年夏，不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邓视察的地方是小兴安岭，也不是大兴安岭。说田被毒虫咬了，邓下令要医院‘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治好’，这更是瞎说。田没有被毒虫咬，什么病都没有。”戚本禹真是一个谣言公司，千奇百怪的谎话都能编造出来。为了说田家英对邓小平感恩并投靠邓，而得到邓的提拔，他居然离奇地造出一个毒虫咬了田家英的故事。

田家英从1948年起，给毛主席当秘书十二三年，由于做出的工作成绩，特别是在1961年领导浙江农村调查和担任“农业六十条”主要起草人之一，做出突出贡献，才升任中办副主任。

戚本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坏事，避而不谈，或者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同时，又隐瞒对他不利的事实真相。1966年5月22日，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住处，向田家英宣布中央的决定：停职检查，工作由戚本禹接管。特别指出田家英犯了两个错误：（一）一贯右倾；（二）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而《回忆录》却轻描淡写地说：安子文“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戚本禹故意回避问题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两个错误。在当时来说，这两个错误对田家英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中央已经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他很紧张。

《回忆录》里说：“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

那时的戚本禹已是红极一时的人物，又接替了田家英的工作，谁还敢整肃他，谁还会把他打成田家英的余党？这种骗人的话，谁会相信？

戚本禹还说：“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责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其实，戚本禹是十分积极地要大家揭发田家英。1966年5月23日上午，戚本禹就到秘书室召集全体科长开会，也叫逢先知参加，要大家揭发田家英，特别要逢先知揭发。王象乾说：“1966年5月23日，戚本禹召集秘书室室务会议，一个人头一个人头点名，要大家揭发田家英。”不久，戚又把秘书室的科长们凡与田家英关系较多或较好的，都划为“黑帮”。戚本禹不仅要秘书室的人揭发田家英，还要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缪楚黄等三人“大力揭发”（戚本禹原话）田家英。他们三人，一直在田家英领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毛选》前三卷的注释进行校订工作。戚本禹这样煽动、威逼上述这些人揭发田家英，能说他和田有温情主义吗？能说戚是“心里同情他”吗？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一天晚上他（指逢先知）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

逢先知说：“我在田家英出事后，是销毁过一些材料，不是文件，也不是烧的。这件事，我当时就交代清楚了，后来组织上也已查清。几十年后，戚本禹别有用心地旧事重提，我在这里必须加以澄清。我销毁的材料，是参加《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时，为了工作需要，做的一些毛主席重要著作摘要。当时是在一种紧张的情况下干出来的一件蠢事。是销毁什么东西把抽水马桶堵了呢？是一个笔记本，里面记有我在1963年秘书室室务会议上批评戚本禹的发言稿，害怕戚本禹报复，才下决心销毁。这个笔记本很厚，是道林纸的，有一个厚纸壳子，这一下就惹出了大祸！”

逢先知说：“戚本禹采取他在《回忆录》中一贯使用的造谣诬蔑、夸大其词的手法。说什么我写了一百多张纸的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这完全是夸张。戚本禹甚至说我揭发田家英说过：‘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这是十分恶毒的造谣诬蔑，既是对田家英的诬陷，又是对我的诬陷。”

参加座谈的同志都说，1962年以后，田家英虽然对毛主席有些不满，但绝不会有这样的仇恨。田家英总是希望重新得到毛主席的信任。1962年以后，每当主席让他办一件事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例如，1963年毛主席要他协助编辑《毛主席诗词》，他尽心尽力地完成，主席很满意。又例如，1964年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带领一个班子，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直到安子文等三人向他宣布中央决定，他才感到完全绝望了。逢先知说：“我想也想不出戚本禹编造的这种话。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很早就提倡火葬。他是在1956年《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党内外人士共136人，田家英也在倡议书上签了名。‘文化大革命’前，谁能想到毛主席逝世后会长眠在水晶棺里，那时想的都是遗体应火化。用水晶棺长期保存毛主席遗体，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才由党中央决定的。据负责保存毛主席遗体的专家说，他们当时毫无准备。这时田家英已去世十年了。戚本禹造谣的时候，根本不顾这些重要事实，反正想怎么诬陷你就怎么诬陷你。”

关于田家英的自杀，和对田家英的看法，毛主席是什么态度？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谢静宜曾问过他。1972年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问毛主席，中办两个副主任都自杀，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毛主席严肃地对她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见谢静宜《毛主席身边工作琐忆》一书）

逢先知说：“1976年，我在江西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劳动，在一个连队的后勤班编竹筐。有一天，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他们是到干校来短期劳动锻炼的），专门到我编筐的屋子，坐在门槛上，对我说：‘主席说，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1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为田家英平反的决定。1980年3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举行田家英追悼会，由邓力群主持并致悼词。

### 十三、从政治巅峰到阶下囚——戚本禹的政治生涯

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别是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之后，达到了他的政治巅峰，成为一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人物。后来戚本禹被关起来，有人揭发戚本禹想当总理。戚对他们说，“那个最大的保皇派不行了，要下来”。他所说的“最大的保皇派”指的就是周总理。

其实，从戚本禹的《回忆录》里，也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戚本禹说：“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很多。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给我送条子过来……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我向江青汇报此事，江青说，总理是太累了，邓大姐说得对，你们要尽量照顾总理，开会太晚不好，应该叫总理早退。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江青说，不是主持继续开会，而是做好会议收尾工作，这是可以的。”

戚本禹把自己抬得这么高，似乎除总理和江青之外就数他了。你看，邓颖超写条子都是给他，而且很多。“我说，中央召开的会，让总理早退，我们来主持，这好吗？”好大的口气！他既不说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也不说由江青主持。这个我们，自然就包括戚本禹了。

大家知道，从1967年“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由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后，周总理的处境愈加困难了。而周总理最困难的时候，也正是戚本禹最得势的日子。关于这段历史情况，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对他们最大的障碍正是来自周恩来。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关于王、关、戚的问题，《周恩来传》写道：“（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

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

“当天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经过一天考虑，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讲：‘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

毛主席对王、关、戚的处置，英明而果断，对极左势力有所遏制。否则，我们的党、军队和国家还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陈毅当时就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可见，在陈毅这些老一代革命家眼里，戚本禹的问题比王力、关锋更严重。

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当叶剑英进来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老是表白自己没有反对总理。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指出，王、关、戚要打倒总理和老师。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上述这段讲话“是叶剑英传达的。他的传达是否准确，尚待核对”。毛主席这次谈话，毋庸置疑，是有记录的，形成一份铅印的正式文件，题目为《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同志时的指示》，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前面说到的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对戚本禹定性的话，就是党对戚本禹所下的政治定论。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戚本禹成为阶下囚。

这次座谈纪要说了那么多，目的就是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并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和其他第一手材料，说明戚本禹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一些才能，但心术不正，为了抬高自己，以至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可以不择手段地什么都干得出来，可以完全不顾事实，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而且说得活龙活现。一般善良的人也许很难想到他竟会到这种程度。只有了解了一个人的人品心术，才能准确地判断他所说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望这些我们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和引用的档案材料，能对读者避免上当受骗，多少有所帮助。

（原文转自《炎黄春秋》2016年第10期至12期，本网转载时，作者对原文做了适当修订）

□ 摘自《求是》网政治频道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